

书评

《问心三部曲》将文学与现实、制度与人性完美融合——

不只是文学镜鉴，更是哲学与法学的深度参照

莫纪宏

作家丁捷的“问心”系列三部曲《追问》《初心》《撕裂》近期集结出版。作为一名法律研究者，在阅读完《问心三部曲》之后，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。这种震撼，不仅源于作品对腐败现象的直面揭示，更在于其借助文学语言，深入人性幽微处的冷静剖析。在法学与文学、哲学的交汇处，《问心三部曲》所提供的，不仅是现象的展示，更是价值的探问，是“良知之问”。

我和丁捷老师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——同为江苏人，同样曾怀揣文学梦。我当年也曾梦想成为作家，少年时写过小说、给杂志投过稿，最终因为中学老师建议填个稳妥的专业，阴差阳错学了法学。如今在法律界耕耘多年，回头看那段文学情结，依然萦绕不去。看到丁捷老师通过《问心三部曲》将文学与现实、制度与人性完美融合，我既敬佩他的才情，也钦

佩他的勇气。

法学与文学本质上并不割裂。法律是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总结，文学则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描与唤醒。法律靠“制度之绳”勒住行为底线，文学靠“情感之光”照亮内心世界。在反腐败问题上，法律告诉人们“什么不能做”，而文学告诉人们“为什么不能做”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坚持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一体推进”。而“想不想腐”的深层自觉，可以通过文学、哲学、文化的滋养来培育。法律可以惩戒行为，但文学才更能震撼人心、唤醒良知。

丁捷老师的作品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难得的样本。《追问》通过口述纪实，叙述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，引导读者深入思考“他们为什么会走向沉沦”；《初心》以文化随笔的方式，从信仰、伦理与价值的角度对“人如何不迷失”进行探索；《撕裂》则通过虚构方式，构建出一个既典

型又独特的精英人物，在理想与现实的撕扯中展现现代人内心的困境。这三部作品交相辉映，不断深入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“问心”逻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问心三部曲》不仅从外部描绘腐败行为，更从内部展开对“心”的追问。何为初心？初心在何处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心”既是道德之源，也是欲望之根。《金刚经》中说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“心不可得”之意，正在于它一旦被欲望、权力、虚荣所污染，便容易偏离轨道，走向异化。丁捷老师的三部作品，其实是一次精神层面的“考古”，通过现实与虚构结合的方式，把那些“不可得”的内心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让人不寒而栗，亦引人深思。

从法学角度来看，丁捷老师的作品还启发我们：真正的腐败不仅仅是贪钱、贪色、贪物——更有一种高级腐败，是对权力的滥

用、对情感的操纵、对责任的背离。例如，有的人并不贪图财物、声色犬马，却极度沉迷于“权力控制感”、让他人“唯命是从”的欲望，这种腐败更具隐蔽性与破坏力。文学恰恰能揭示这些法律难以量刑的“精神腐蚀”。

我特别认同丁捷老师提出的“文学作为一种良药”。反腐败是一场复杂的攻坚战，法治之力是“刚性药方”，文学之光是“温性药引”。很多官员在接受调查之前并非不知道“法纪高压”，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滑向深渊，是因为内心的“价值防线”早已崩塌。而《问心三部曲》在一遍遍“叩问人心”时，或许正是在悄然为读者筑起这一道隐形的精神防线。

当然，文学要想深入地处理这类“高维腐败”现象，还有待技巧与哲思的融合。我们法律人也要从中学学习，用更多生动案例与人性故事提升普法实效，让法律

教育从冰冷的规范中走出来，直达公众的情感中枢。

文学、哲学与法学若能合力，将构成更具穿透力与唤醒力的社会反腐败体系。《问心三部曲》已经在这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，是当前相关主题中难得的“现象级”代表作。期待未来有更多作家、更多作品，能够以如此诚恳的态度、深刻的眼光、理性的笔触，为反腐败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文化支撑。



剧评

我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偶然点开这部纪录片的。本来只想随便看看，却一发不可收拾地沉浸在了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中。直到一条弹幕飘过：“没有左公，哪来今天的哈密瓜自由？”我不由得心一笑，这句看似玩笑的话，却道出了历史与我们的生活之间那种看不见却实实在在的

联系。

今年正值左宗棠逝世140周年，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、甘肃省委宣传部，湖南广播电视台集团（湖南广播电视台）联合出品的六集纪录片《左宗棠收复新疆》，可谓恰逢其时。制作团队历时三年，精心创作，生动地塑造了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刘锦棠等历史人物的形象，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程娓娓道来，不仅重现了历史现场，更让我们了解了一位湘湖英杰是如何与西北大地结下不解之缘的。

历史学者纪连海说得好像：“与其说是破掉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，不如说是左宗棠创造了这一段历史。”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。历史从不缺少“如果”的悬疑，若左宗棠未在湘江夜谈中接过林则徐的新疆舆图，若清廷最终采纳了李鸿章的“海防论”，今日中国地图又将呈现何等模样？纪录片的镜头将答案揭示：新疆当时已陷入“阿古柏割据天山南北，俄人强占伊犁，英人虎视南疆”的危局，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。当李鸿章断言新疆乃“千里旷地，得不偿失”时，左宗棠“尺寸不可让人”的铮铮之言，不只是对于地理主权的宣言，也是一种文明存续的倔强。

作为晚清的“一块硬骨头”，左宗棠确实与众不同。他出淤泥而不染，点燃自身的正气，将其作为一团火把，在浑浊的时代照亮自己、照亮黑暗、照亮时代。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，更是国家之幸。令我战栗的除了战场上的硝烟，更多的是历史洪流里那些未被充分言说的个体痛楚。63岁的左宗棠，在承受五年内连失四位至亲的剧痛后，仍毅然扛起西征大旗。纪录片的镜头从他未能送别妻子的灵位移向哈密大营摇曳的烛光，这种家国难以两全的苦痛，比任何战场厮杀都更令人窒息。湖南人“吃得苦、耐得烦、霸得蛮”的特性，在左宗棠身上演化成一种独特的担当，那不是英雄主义的浪漫抒写，而是一种真真切切地将个人碾碎为历史铺路石的悲怆决绝。

纪录片最动人的创新，在于将宏阔历史解构为可感可知

的细节。比如，纪录片将左宗棠筹备粮草的数量精确到每匹战马、每峰骆驼的运力，以及改造后的“后膛七响枪”比英制恩菲尔德步枪快一倍的射速，这些细节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扁平化的结论。而在宗棠身上那股“灵泛”和“韧劲”，也从这些细节中得到淋漓尽致

的展现。

左宗棠的“系统思维”至今仍给人以启迪。他提出的“缓进急战”战略，是对新疆地理气候特性的精准把握；他统筹“海防”与“塞防”的辩证视野，展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全局观，这种思维在当今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显得尤为珍贵。

从林则徐在湘江夜话中将重任托付给左宗棠，到左宗棠在兰州帅府挑灯理政，湖湘文化的精神在历史关头总是如此滚烫。当镜头切换到今天新疆的孩子在左公柳下奔跑的画面，我突然理解了何谓“历史通过地理呼吸”。这些柳树既是生态屏障，也是一种精神象征，代表着左宗棠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责任。

纪录片没有把左宗棠塑造成孤胆英雄，而是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性格鲜明的人物：冒险借款的胡雪岩、沙场冲锋的刘锦棠，还有与湘湘子弟并肩作战的西北各族百姓。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展现出来的“心忧天下、敢为人先”的精神，跨越地域和民族，成为整部作品的灵魂。左宗棠和那个时代的无数人共同织就了这幅历史画卷，并赋予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：伟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舞，而是一个民族的合唱。

六集看罢，嘴里感觉又尝到哈密瓜的甜。可这甜，是与左宗棠抬棺出征的苦并生的。今天的每一寸和平，都曾有人用生命守护；每一个平凡的幸福瞬间，都连着历史深处的付出。左宗棠那口西征的棺材从未真正沉入历史，它化作了无数精神坐标，分布在山河之间，静静等待祖国需要时的那一声呼唤。

走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，我们都该记得：这里的安宁与自由，不仅是左宗棠和将士们用生命换来的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新疆实施的政策结出的硕果。那些人、那些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，更值得我们将那种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”的精神传承下去。



节取自《左宗棠收复新疆》纪录片海报

读着《山南记》游山南

吕雪莹

作家的眼睛跟摄影机的眼睛，长得不太一样。我深深着迷于这些不一样，常常比对和对照文学作品里的场景与镜头摄录的影像。

我去过西藏的拉萨、日喀则、绒布寺珠峰大本营，也见识过哲蚌寺的“晒大佛”仪式，磕过长头，喝过酥油茶，吃过糌粑，但就是没去过山南，最近才终于成行。读阿来的作品时，我一边读文字，一边打开影音频道播放西藏自驾旅游、山南景点介绍的视频，无限风光同时来到眼前。阿来的散文笔触细腻，《山南记》像是长长的山水画卷，以一种移动的视角，引领读者漫漫游走于藏地山川。隐约还有阵阵画外音传来，那是阿来让历史遗迹发出声响，让典故与古人轻声说话。相较之下，频道里的影像就过于有压迫感了。

阿来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，2000年以其民族题材作品《尘埃落定》获得第五茅盾文学奖，彼时他正当盛壮，是这个奖项创办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。他身上还有另一个标签：藏族作家。他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市（位于川藏茶马驿道上，马帮往来之

地），早年从事诗歌创作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。从散文《山南记》里，可以看见他对成长之路的回望，以及对藏地历史文化的省察。

我很喜欢《山南记》的叙述语气，低调沉着不浮夸，轻重快慢都刚刚好，有余音不绝的音响效果。长篇散文的写作，很容易流于拖沓啰唆，把话说得太多太满太重，读完之后没有余味。《山南记》像一只巨大的颂钵，叩击之后让我陷入沉思，触发同情共感，照见生命形式的完成。

书名里的山南市位于冈底斯山至念青唐古拉山以南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。此地东接林芝，向西通向日喀则，北行则是拉萨，南边是印度、不丹两国。书中提到，此地的人类物种起源有一传说：神猴与一女子结合，然后生出了雪域人种。山南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，高原上的所有生命形式，美得几近不可思议，美得像是具备神性。跟随阿来的文字展痕可以发现，西藏并不是只有险峻的高山、壮丽的冰川，也不全是寸草不生的荒原，这里是亚洲

大陆的水库，重要水系的源头，水资源的命脉。这里有高海拔植被覆盖，花树峥嵘共生，青稞种子代代相传，这些都是有形生命力的大规模展现。至于无形的生命力，则蕴藏在藏区人民的心念之中。阿来散文里的桃树、李树、梨树、康定木兰，在时序流转之中各自生存。然而在故乡的春天，他感伤着现代文明逼近，田园风光将要消失。举行农事耕种之际，他担忧古老的开犁仪式再也无法传承。这些情绪的起因极为复杂，一方面可能来自钢筋水泥等现代化开发力量的压迫，一方面可能来自人类中心主义的横行。

感慨系之，《山南记》认为一切有情，以平视的眼光照看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。唯有如此，生态公平、土地正义才能不流于口号。自然保护区的设置，正是为了给人类活动划定一个界限。划定界限，人类才有机会明白边界与分寸。

特殊的地理风貌孕育出特殊的人文景观。阿来透过描绘空间意象，逐步梳理出血缘物种与文化历史的繁复因缘，这之中有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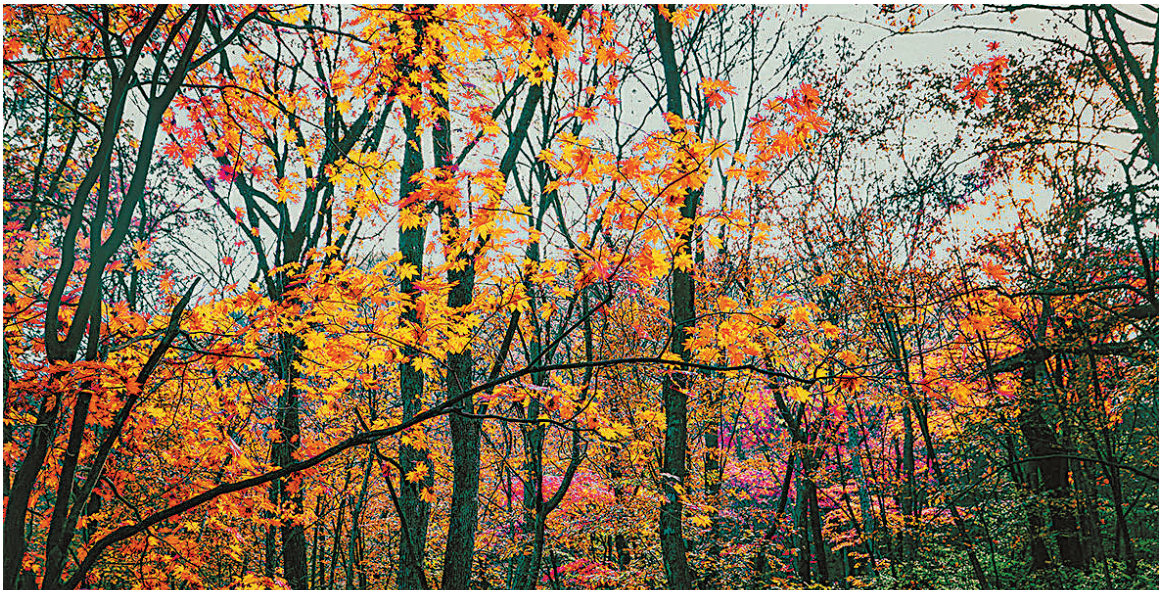
山南风光

同，有流变，有融合。对人类来说，或许最好的生存理念就是不再起分别。阿来坦言，他的藏族血统来自母系，父亲则是回族，于是难以把自己放进种族归类的框架，表明族群身份时，只好选择血液中某一特定成分较多的那个民族（即因吐蕃短暂强盛统一而形成的藏族）。藏族人身上往往贴有佛教教徒的标签，但阿来不是。他不是

文苑笔谈

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

戚思翠



霜降秋叶黄

张成林摄

霜。此外，人们还把立春叫“打春”，雷鸣叫“打雷”，闪电叫“打闪”，连衣服淋湿了也叫“打湿”，这些质朴的方言，颇有原始的生动。

农谚有云：“寒露无青稻，霜降一齐倒。”这是以寒露与霜降为时间节点，总结稻作成熟与收割的规律。“霜降不割禾，一天少一箩”，这说明了霜降节气是割稻谷的最后期限。在那物资匮乏、粮食奇缺的年代，莫说少一箩，少一把都会让人们心疼得要命！霜降至，正值“三秋”大忙时节，农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，趁着好天气，抢收金灿灿的稻谷。过去，老家有“立冬不种田小麦”之说，就是说要赶在立冬前种麦。“下半年不打囤，春上无指望”，

人们摘完棉花，拔回秸秆，整地打囤。庄稼人善于看霜识天气，初霜开始，便有条不紊地安排农事，“霜重见晴天”“霜打红日晒”“一朝有霜晴不久，三朝有霜天晴久”。天上繁霜降，人间秋色深，在秋霜的浸染下，漫山的红枫、梧桐装点着似锦的晚秋。霜，看似冷酷无情，附在瓜果蔬菜表面，却有益无害。看，满树红灯笼似的柿子，是晚秋一道亮丽的风景，霜后的柿子尤为光鲜、甜润；瞧，打霜后的青菜萝卜，吃起来也脆爽爽、甜丝丝的。那是岁月的回甘，是浓霜的深情惠顾。

霜降至，天变冷，却不会让人们们对大自然的喜爱减少半分。那时，学校一律放“农忙假”，大概一

周或十天半个月。这既是为了让孩子们帮助父母种田，缓解农村大忙时的“燃眉之急”，又是为了让孩子们体验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。天才麻亮，大人们就下田收割稻子了，临走前再三叮嘱家里的孩子们：别睡过头了啊，等会儿到田里拾稻穗，去迟就被人家拾光了！晨曦未露，田野里就开始喧腾了，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，像赶集似的集中到田地里忙活起来。大一点的孩子懂事、勤快，能帮父母割稻谷、捆稻谷、扛稻把；很小的孩子边拾稻穗，边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玩得不亦乐乎！碰到稻禾上的禾虾（稻蝗）“呼”的一声飞起来，他们会快速地追赶过去，小手儿猛地